

# 台湾经济增长分析

李 非\*

经济增长是经济现代化成果在量上的表现,主要反映经济产出规模的扩大,其中心现象是国民收入持续提高。资料显示,1952—1992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从新台币172亿元增至5.31兆元,增长了308倍,平均每年名义递增率高达15.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率仍为8.7%;同期每一劳动力产出从不到6千元增至62万元,增长了103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12.3%;人均产出从2千余元增至26万元,增长了126倍,平均每年名义递增率达12.9%,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为6.3%。以美元计算,至1992年,台湾经济总产出达2千多亿美元,平均每一劳动力产出2.5万美元,人均产出超过1万美元。经济产出的大幅增长使台湾经济总量成倍提高,其在世界的排名从早期40名以后跃居20名以内,在亚洲则位居第六名;人均产出从世界80名以后跃居第25名,在亚洲排名10名以内。可见,战后台湾经济的显著发展使台湾从一个经济低度发展地区进入经济中度发展地区,并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前列,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如果进一步对经济产出的各项要素进行分解,台湾经济成长的整个画面就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来源,一般可按生产形态、分配型态及支出型态分为三个方面。

## 一、生产型态的分解

经济产出的增长包含三大产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附加价值的增加。很显然,产出增加并不意味着三大经济部门产出同时增长。从统计数据看,台湾工业生产增长最快,其附加价值从1952年的34亿元新台币增至1992年的2.15兆元,增长了633倍,平均每年递增率达17.5%,其间在经济起飞时(1960—1973年)年递增率更高达20%。这显示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工业化带动的,经济的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但是,80年代以来工业发展速度则明显趋缓,增长率降至2位数以下,这又说明工业生产的“引擎”转速已有所减低,逐步退出推动经济成长的“主导者”的地位。在工业生产中,增长最快的部门首推水电燃气业,同期从1.6亿元增至1482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率高达18.7%;制造业的表现也不逊色,从22亿元增至1.71兆元,平均每年递增率为18%;建筑业增长速度略慢,从6.7亿元增至2673亿元,平均递增16%。

服务业在经济成长中也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产出从1952年的83亿元增至1992年的2.87兆元,增长了345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15.7%,尤其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它产业,逐步代替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在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属金融保险及工商服务,其产出同期从16亿元增至1兆多元,平均每年递增率达17.

\*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

4%；其次是运输通讯业，从7亿余元增至332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率为16.6%；政府服务业也从16.6亿元增至5903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5.8%；而商业产出增长相对略缓，从30亿元增至842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5.1%。随着台湾经济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服务业的产出将继续保持较好的势头，尤其是社会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以及一些新兴服务业。

相对说来，农业的产出增长较为缓慢，在经济成长中的角色日趋淡出。不过，在台湾经济起飞前，农业也曾发挥支持工业、稳定经济的作用。50年代台湾农业产出增长一度表现较好势头，产值从1952年的55.6亿元增至1960年的178亿元，增长了2.2倍，平均每年名义递增率达1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仍有6%。但此后农业发展步伐明显放缓，虽然绝对值至1980年提高到1,146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名义增长率却降至2位数以下，实际增长率只有3%。80年代以后，农业产出增长趋向停滞状态，至1992年产值仅升至1,843亿元，名义增长率只有4%，实际增长率不到1%，尤其是近3年随着农用地不断释出，增长率更降至零以下，产出呈下滑趋势。可见，台湾农业发展后劲乏力，走势看跌。

## 二、分配型态的分解

经济产出从分配型态看，结构比重最大的是家庭及民间非营利机构收入，其金额从1952年的133亿元新台币增至1992年的3.95兆元，增长了295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15.3%。其中受雇人员报酬增长较快，同期从62亿元增至2.74兆元，平均每年递增率达16.4%，不过，80年代以后增长率却降至12.1%；民间财产收入增长率明显低于劳动收入，平均约为13.7%，即从1952年的71亿元增至1992年的1.21兆元，但是，8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超过劳动收入。这显示台湾民间财富从早期分散于劳动者开始转向集中于有产者。此外，民间收入中来自企业的转移在80年代最高峰时一度达191亿元，但从总体上看却呈下滑趋势，即由1981年的79亿元降至1992年的22亿元，减少了57亿元，平均每年递减11%。可见，台湾国民收入主要是由民间及家庭收入带动成长的。

在国民所得的分配中，一般政府收入增长略快于民间收入，1952年时不到25亿元，至1992年增至7,455亿元，增长了303倍，平均每年递增率达15.4%。政府收入来源主要是间接税净额，同期从18亿元增至5,513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率为15.3%；而企业直接税增长明显快于间接税，平均增长率为17.1%，高出1.8个百分点，约从2.7亿元增至1,491亿元；政府财产收入增长速度略低，平均约为12.5%，即从3.5亿元增至397亿元。此外，企业罚锾收入80年代以来每年约有数十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率为7%，即从1981年的26亿元增至1992年的54亿元。

要素所得中的公司及准公司企业的储蓄，在1952—1992年间，从5.3亿元增至1,504亿元，增长了280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15.1%，其中民营企业约占三分之二，公营企业约占三分之一。前者的储蓄增长起伏波动较大，近年约在1千亿元上下摆动；后者则较为稳定，每年大致维持在500亿元左右。

从民间、政府及企业三大收入项目中可以看出，三者的平均增长率大致相当，但是最大来源当属民间收入，占80%以上；次为政府收入，约占15%左右；企业收入比重最小，不到5%。以上三项合计即为按市价计算的台湾国民收入（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减固定资本消耗准备），其金额约从1952年的163亿元增至1992年的4.85兆元，增长了296倍，平均

每年名义递增率达 15.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仍有 8.3%。以美元计算，此间国民收入从不到 16 亿美元增至 1927 亿美元，增长了 120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 14.5%，人均国民收入则从 186 美元增至 9332 美元，增长了 49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 10.3%。若扣除间接税净额，同期台湾的国民生产净值（即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民所得）从新台币 1.5 亿元增至 4.3 兆元，增长了 295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 15.3%；人均净产出也从 1698 元增至 20.8 万元，增长了 122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 12.8%。

### 三、支出型态的分解

经济产出从支出型态看，可分为消费和积累两大项，其中前者包括民间消费与政府消费，后者包括投资、出口净额及海外要素所得净额。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消费开支一直是台湾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在 1952—1992 年间，台湾国民消费从 156 亿元新台币增至 3.82 兆元，增长了 243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 14.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仍有 7.8%。以人均消费水平衡量，同期则从 1,834 元增至 18.5 万元，增长了 100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为 12.2%。消费支出在早期成长较慢，50 年代实际增长率只有 6% 左右，60 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水涨船高”，实际增长率接近 2 位数；在经过 80 年代初期的几年低潮后，至 80 年代后期又再度掀起新的高潮，连续 3 年实现 2 位数增长，其中 1989 年实际增长率一度达到 12.5%，创近 40 年来最高纪录；进入 90 年代，消费支出增长又回落到平均水平。

消费开支中民间消费占最大比重，其支出金额从 1952 年的 127 亿元增至 1992 年的 2.9 兆元，平均每年名义递增率达 14.5%，实际递增率为 8%；同期政府消费从 29 亿元增至 9,114 亿元，平均每年名义递增率达 15.4%，实际递增率为 7.3%。可见，民间消费开支是台湾国民消费的主体，它带动了台湾约一半以上的经济生活。民间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是交通与通讯支出，80 年代以来平均年增长率近 20%；其次是教育与文化娱乐开支，年增长率达 18%；水电与房租支出增长也在 15% 以上；相对说来，食品消费、服饰及日用品等非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增长较慢，平均年增长率均未超过 10%；而家庭器具及设备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增长略快，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2 位数。总的看来，战后台湾民间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不过近年来已有所回升。

从积累过程看，战后台湾经济产出中用于积累的部分不断扩大，其金额从 1952 年的 15.9 亿元增至 1992 年的 1.49 兆元，增长了 940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高达 18.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也达 14.5%。同期台湾人均积累量从 186 元增至 72,290 元，增长了 388 倍，平均年递增 16.1%。不断膨胀的积累在早期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在经济起飞前后出现高速增长势头，在 1952—1973 年间平均一直保持 23.8% 的年增长率；其后增长速度虽有所放缓，平均年递增率降至 13.2%，但其积累速度仍然快于消费支出。

从投资与积累的关系看，早期投资明显大于积累，二者之间的比例在 1952 年时为 1.67 : 1，其差额通过净进口与外国投资弥补；其后随着产出增加，消费减低，积累扩大，二者比例逐年下降，至 1965 年为 1.16 : 1；在经济步入起飞阶段后，积累开始超过投资，并逐步拉大差距，至 1992 年投资与积累的比例缩至 0.85 : 1。除投资外，积累余额主要是由出口净额及海外要素收入净额构成。台湾商品及劳务输出自 1971 年由入超转为出超后不断扩大，至 1987 年最高峰时达 5,614 亿元新台币，其后虽有所回落，但至 1992 年仍有 1,

21.1 亿元的余额。台湾海外要素所得净额在 80 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自 1983 年转为盈余后日益增加,至 1992 年达 1,034 亿元,增长了 30 倍,加上净出口合计约 2,250 亿元。这显示,台湾积累的扩大,除了产出增加、消费减低这一基本因素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积累是由净出口增加和对外投资盈余带来的。

从投资与储蓄的关系看,70 年代以前台湾投资额基本上大于储蓄额,其比例大致在 1.1:1 左右;之后随着台湾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储蓄额大幅提高,其与投资额之反比开始发生逆转,并持续扩大,至 1986 年最高峰时达到 0.44:1,是投资额的 2 倍多,扣除投资后的储蓄余额多达 6,245 亿元新台币;近年这种扭曲现象得到改善,比例有所回落,1992 年已降至 0.85:1,接近合理水平。可以说,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是在高储蓄率下实现的。在 1952—1992 年间,国民储蓄毛额从 26.4 亿元新台币增至 1.49 兆元,增长了 562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达 17.2%;同期人均储蓄额从 309 元增至 7.2 万元,平均年增长率为 14.6%。储蓄毛额中扣除固定资本消耗准备,储蓄净额同期从 17.3 亿元增至 1 兆余元,增长速度与储蓄毛额大致相当;而资本折旧则从 9 亿多元增至 4,589 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率为 16.8%。储蓄毛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 1952 年的 15% 提高到 1992 年的 28%,上升了 13 个百分点。在经济起飞前,台湾储蓄率一直在 20% 线下徘徊,60 年代中期起提高到 20% 以上;70 年代经济起飞后又跃至 30% 线上,至 1986—1987 年达到最高峰,创下 38.5% 的新高点;其后又逐步回落到正常水平。同期储蓄净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也从 10.6% 提高到 21.2%,上升了 10.6 个百分点,其间在 1987 年最高峰时一度达 32.7%。

#### 四、稳定中的增长

战后台湾经济产出的显著增长基本上是在物价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实现的。自 50 年代中期起,台湾经济在美国经援的支撑下开始逐渐趋向稳定,为其后产出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60 年代在“稳定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稳定”的基本经济策略下,台湾经济逐步步入光复以来物价最平稳的时期。在 1960—1972 年间,岛内批发物价上涨了 26.9%,平均每年上涨率为 2.0%;消费者物价上涨了 47.5%,平均每年上涨率为 3.3%。这一相对稳定的经济形势主要是由于岛内财政和外汇收支得到改善、货币增加率得到控制以及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水平波动较小等多种因素促成的。它为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70 年代台湾虽经历了两次由世界性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但在及时有效的“冲击疗法”下物价涨势很快得到控制,从而促进经济较早走出低谷,重新进入扩张阶段。80 年代以后由于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回落,国际市场物价趋稳,台湾经济免受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威胁。在 1982—1992 年间,台湾的进口物价下跌了二成多,平均每年回落 2% 强;批发物价也逐年下滑,除了 1984 年和 1991 年微幅增长外,其他各年均呈负增长,1992 年比 1982 年下跌了 14.4%,平均每年递减 1.5%;批发物价下跌使零售物价涨势平稳,80 年代中后期基本上在零线上摆动,90 年代初虽有微幅增长,但仍未超过 4.5%,1992 年比 1982 年约增长 22.1%,平均每年仅递增 2%。这一物价形势在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涨势甚至低于 60 年代黄金时期,从而为经济升级转型与适度扩张提供有利条件。

(本文责任编辑 高群服)